

短論·觀察·隨筆

漢語命運，國人自我認同 和語言政治學

• 吳 彥

香港中文大學在2005年曾因為教育語言問題引起過一場風波。然而在此事件之中，除了某種情感的宣洩之外，人們對於事件背後的根由並未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和探討。或許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內地的英文化傾向，並沒有像香港這一受外來文化影響甚巨的地方這樣強烈。因此除了在此事件之中國人所表現出的某種默然，以及某種對於港人所表現出的那種「離異」之外，人們並不在意於（甚至也並不擔憂）自身文化——語言所可能會遭受到的那種挑戰。因此，處於某種特定情勢和地理環境之中的人，就更有可能感受到以及窺視到，我們這樣一個文化—語言共同體在當下所可能遭遇到的某種危機。香港中文大學的關子尹教授在此風波發生不久就撰文，以德語在十七世紀所遭遇到的挑戰為參照，表達了漢語在當下世界之中所面臨的某種危機，以及針對此種危機而試圖加以解決的各種方式。

關子尹在此篇文章中認為，當下漢語，甚至是其他各個民族的語言所

遭受到英語的挑戰，在根本上是「全球化」的結果，並且認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世上各民族語言將一一向英語讓步，亦將無可避免。在英語強勢的籠罩下，世界上各種語言能堅持自己的特性到哪一地步和能堅持多久，完全是一個文化動力學的問題。」^①也就是說，語言—文化的命運在根本的意義上是由「文化動力學」所支配的，強勢的文化必然在其最終的時間意義上「戰勝」，甚至於「支配」弱勢的文化，並且在一定意義上，文化被看成是某種外在的、超越於個人之上的「集體表象」，是某種非政治性的，並且只是為這樣幾個主要因素所決定的「自主之物」，一是「語言的群體 (linguistic community) 的大小」；二是「語言的歷史文化沉積有多厚實。」^②關子尹正是依據這樣兩個主要的判斷標準來分析德語以及我們的漢語的歷史命運^③：

今日德語面對的壓力是來自比當年的法語「塊頭」大得多的英語（母語及外

語使用者合起來計算)，因此情況便比以前要不樂觀了。幸好的是今日德語的歷史文化沉積比萊布尼茲的時代要厚實多了，因此德語面對英語或許還有一點角力的餘地，但這大概也只能像聯署者所聲言一般，但求勉力自保而已；而且如果萬一最後守不住，德語於學術領域大概只能保持作為一種「對象語言」，而終於喪失作為「操作語言」的地位，……德語未來便將再談不上活力，更遑論創新。再看漢語的情形：以中國地域之廣與人口之眾，單就語言群體的能量而言，便不容低估。再就歷史文化沉積而言，中國數千年文化各方面持續累積的成果，將使漢語長久地保持強大的競爭力。……不少學者都認為，當許多語言會相繼被英語壓倒之際，漢語將是為數極少終於能與英語抗衡的語言。

但是，這種「文化動力學」的解釋方式是否確切地刻畫了當下國人所面臨的外來文化的挑戰？我們是否還可以找到另外一些更為根本的解釋方式，來對現實進行合理的解釋？還有，是否存在某種更為基本的東西，

致使我們陷入於這樣的強—弱文化之爭，而遺忘了某些更為基本的因素，例如政治本身？

一

關子尹對於漢語的憂慮，以及十七世紀的萊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Leibniz) 對於德語的憂慮，在某種意義上都預設了這樣一個基本的前提以及基本的信念：一種語言是與一種文化同生的，並且也是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最為基本的因素。語言在某些生物學家那裏可能只是某種交流的工具，但是對於關子尹而言，語言不僅僅承載着當下的交流的功能，更為重要的是承載着某種更為基本的歷史—文化的功能，各個詞語本身所意指的那個表象，以及由這些詞語所構成的話語所指涉的那些意義系統，都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性的。

因此，當人們開始漠視甚至於遺忘自身語言所承載的那些意義體之後，對於自身之確證以及自我之認同便隨之受到嚴重的懷疑和挑戰。其對



於語言以及人之歷史性的此種關懷，與「五四運動」之時的新文化運動所促成的、對於傳統語言的敵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那個時代，所有的東西都被納入到這樣一種對比之中：舊一新，以至於所有的現實性因素都被納入到「新一舊」這樣一種模式的價值評價體系之中，並由此對現實世界進行某種是非的規劃。在這樣一種「新人」觀念的支配之下，所有的文化運動以及政治運動都在根本上與「歷史」這個代表「落後」和「陳舊」的詞語決裂。因此，正是這樣一種作為現代性之一個面相的「新一進步」觀念，從五四開始就一直在支配着我們對所有現實事物的看法。

儘管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關子尹對於語言之歷史性因素的強調與五四運動的語言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但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關子尹並未像對於五四之語言觀之抗拒那樣，抗拒潛在於五四之中的那種現代性的因素，並且相應地，在論述漢語之歷史命運時，他完全與五四共享着同樣一種因素，即一種潛伏於五四精神之中的現代性—進步觀念。他對語言之歷史命運所涉及到的諸種因素進行分析之時，都潛伏着語言的歷史進步觀。「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世上各民族語言將一一向英語讓步，亦將無可避免」，「漢語將是為數極少終於能與英語抗衡的語言」。在這樣一種語言的歷史進步觀之下，歷史的最終語言結構就是「英語—漢語」的某種最終的對決，而支配這種發展和決定這種最終對決的就是「文化動力學」。但是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英語在世界範圍的這種支配性力量，是在兩種相互交織的因素——現代性與自由主義——的

共同作用下產生而被不斷加強的。同樣，中國的漢語在當下所受到的外來語言，尤其是英語的挑戰，在根本意義上是「自由主義—現代性」的觀念性支配所產生的後果，而並非某種「文化動力學」的自然後果。

二

在此，我將首先對關子尹的「文化動力學」進行進一步的剖析，並且由此引出我所說的「自由主義—現代性」的觀念性支配所造成的各種可能的諸如「文化動力學」的解釋。接下來，我將探究由此解釋而導致的「去政治化」的傾向，以及由此而遺忘了原本可能對於語言—文化，甚至民族之生存更為根本的政治—國家因素。

我並無意對關子尹的「文化動力學」的諸種構成要素進行具體的分析，而只是對於其所基本依據的那種前提性的設定，即其構想的那種「動力學」機制的基本形象，以及支配他用這種模式來對語言進行此種分析的那種觀念進行分析。關子尹認為，語言的這種「文化動力學」主要依憑這樣兩種要素：一是語言的廣度，即「語言的群體的大小」，一是語言的深度，即「語言的歷史文化沉積有多厚實」，他認為通過這兩種要素之比較和分析，我們就可以對於語言之歷史態勢做出一種預測。很顯然，關子尹在這裏所處理的語言，就如同其所處理和測量一個物理對象一樣，通過對其質量和速度的確定而預測它未來可能的運動方向。這樣，語言成為了一個純粹的自然之物，或者說成為了某種超越於個體所支配之外的客觀之物，任

何個人和集體的意志性因素都被排除出去了，這樣「文化動力學」就實現了某種物理學的分析效果。

但是同時，我們所要繼續加以追問的是，是甚麼東西在促使着關子尹要對語言進行如此這樣的分析，是甚麼東西在支配着他對於語言的此種想像？在我看來，此種語言觀念的一個基本的根源是某種實證主義的經驗性研究，以及某種自由主義的政治學的觀念性支配的後果。他潛在於整個現代對於語言的想像，以及由此而促成的某種語言學的轉向之中。

在此，對於這種語言觀念的整體性批判並不是本文的意旨所在，我所要表達的只是試圖從這種語言觀的一個面向，用某種「語言的政治學」來對這種自由主義的語言觀念的去政治化傾向進行某種檢視。並且試圖闡明語言現象決不是非政治性的，也不是某種超越於我們之上的客觀之物，更不是某種我們可以去認真對待的、純粹工具性的東西。

三

對於語言的困惑以及對這一問題的哲學性考察，在古希臘就已有端倪。但是現代對於古希臘的語言觀念的關注，在根本上接受了一種實證主義觀念的前提性預設，從而以一種經驗性的意識去觀察他們之於語言的思考。然而，我們就此所遺忘的是古希臘人在對待其語言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強烈的政治的自我意識。他們首先把會語言者與不會語言者區分為「人—非人」，進而把會希臘語的人和不會希臘語的人區分為「希臘人(文明人)—非希臘人(野蠻人)」，從而在他們的

世界秩序中，在某種意義上是用語言(希臘語)來界定世界等級秩序的。因此，在他們看來，語言決不是一種無所謂的東西，也不是一種可以隨便擁有的東西，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種政治性的蘊涵，並且在根本的意義上代表了人在城邦中的位置，甚至於說是宇宙中的位置。這種「語言的城邦」所意味的東西，正是我們現代人所謂的某種「民族」的自我認同。只是在古希臘，他們的認同單元並不是某個「民族」，而是某種「城邦」，甚至於說是一個「希臘城邦共同體」。這樣，對於語言的某種自我意識在根本上是與人的自我認同聯繫在一起的，並且由此是與某種認同政治聯繫在一起的。

對於此種語言觀念的破除，在一定意義上是與現代自然科學，以及由此而主張的各種普遍化的要求聯繫在一起的。這種科學把語言作為一個客觀的對象進行對象性的處理，並且把所有的語言置於同樣的位置之上，排除其所有「主觀性」的成分，並試圖在這樣一個「諸語言整體」之中，即在「語言」這個共同表象之下來對「它」進行「客觀」的分析，通過它的各種元素以及各種影響因素，而把其刻畫為一個客觀之物。這在哲學上的語言學轉向之後就變得更加明顯，語言取得了某種先驗的位置，從外在的客觀之物成為了一種使我們得以可能的內在的客觀之「物」。但是於此同時，這種轉向也促成了我們對於語言的某種更為根本的關切，因為它成為了那種使我們，甚至於是我們的存在——「是我們自己」——得以可能的條件，並且由此，導致了這種語言觀念起來反對自現代科學而來的語言觀念，進而過渡到一種更為前提性的觀念：語言的政治學。

我在這裏所謂的語言政治學是與這樣一種觀念聯繫在一起的，就是認為語言不是一種純粹的交流工具，亦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積澱而成的客觀物，語言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所關涉到的是人(民族)的自我認同，並且這種自我認同必須要通過國家—政治而獲得某種自我的主張。或者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說，這種政治因素在根本意義上是先在於某種語言的經驗分析以及客觀存在的，並且從某種意義上看，「語言的政治性」是語言存在之得以可能的前提性條件，它相對於語言而言，總是一種先驗的東西。

從對於語言的這種觀念出發，我們再重新回顧當年那場關於漢語—英語授課的風波。在關子尹看來，這場風波可能僅僅只是語言—文化之勢力的一个較量——一種強勢文化和一種弱勢文化的較量——或者是一種優質語言和劣質語言的較量，因此，對於英語化的回應，在一定意義上來看就成為一種無所謂的東西。因為這種語言的較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語言的群體的大小」和「語言的歷史文化沉積」，而這兩個因素在我們看來是某種既定的，外在於我們意志之外的，完全無法對其有何作為的東西，並且即使我們有所作為的話，也只是在於去增加這樣兩個作為語言之歷史命運之衡量標準的量。因此，漢語—英語在很大意義上對於我們而言是同值的、同質的，僅僅可能只是某種偶然的因素而使得我們要保全漢語、發揚漢語，因為漢語不是一種「必然」要被淘汰的語言，而是一種為數很少的可以與現在佔支配地位的英語相抗衡的語言。因此，漢語正是依據這種「必然性」——根據文化動力學而獲得其存在根據的必然性——或「優質性」——

其群體的龐大以及其歷史的悠久——才擁有被保全和發揚的權利。

儘管關子尹對於漢語當下的處境的憂慮不無道理，並且其懇切之處讓人動心，但是，其對於語言的基本觀念卻在根本意義上沒有關注到這與人的自我認同、自我確證密切關聯着的政治性，以及由此而可能被提出的一種「政治主體性的語言共同體」觀念，這種觀念要求群體之自我認同的一個根本前提是政治的自我主張，它要求某種政治的積極參與。民族的語言—文化決不是一個客觀的問題，語言—文化的問題在根本意義上是政治的問題，是必須通過政治積極參與進去的問題，「德國學界的聯署事件」或許在一定意義上正代表了這樣一種政治的積極參與。

當然，關於漢語—英語授課所引發的這些問題還遠未為我們加以充分的思考，本文所提示出的這些思考也僅僅是由此事件所引發的問題的一個面向，並且由本文所引發出來的一些問題，諸如語言—文化—自我認同—政治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也遠未獲得解決，並且需要在進一步對語言和政治進行哲學反思之後才可能獲得更為清晰的解答。

註釋

- ① 關子尹：〈萊布尼茲與現代德語之滄桑——兼論「語文作育」與民族語言命運問題〉，《同濟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頁9。此文節本〈現代德語的滄桑對漢語未來的啟示〉曾於《中大學生報》2005年2月號刊登。
②③ 關子尹：〈萊布尼茲與現代德語之滄桑〉，頁9-10；10。

吳彥男，吉林大學理論法學2005級碩士研究生。